

●●金景芳 吕绍纲 吕文郁 / 著

kongzixinzhuan

孔子新传

KONGZIXINZHUAN

长春出版社

由金景芳先生创议、设计，由金景芳、吕绍纲、吕文郁教授合作完成。

金景芳（1905-2001）为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，一代国学大师，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导师。该书是金先生毕生研究孔子的一个总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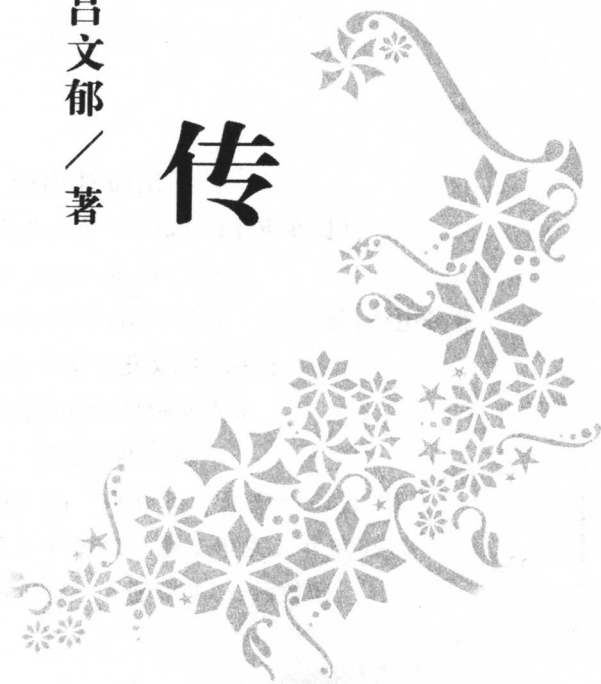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分为八部分：①如何评价孔子；②孔子的生平与事业；③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；④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；⑤孔子的教育思想；⑥孔子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；⑦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——六经；⑧孔学流述评。

这本书有如下特点：①时下常见的孔子传记往往以叙述孔子的生平为主，而本书则以叙述和评价孔子的学说为主。书中虽然也有两章专门叙述孔子的生平和事业，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。②本书开篇即设《如何评价孔子》一章，阐述了孔子研究中的一一些原则问题，对学术界流行的一些有关孔子研究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。③金景芳教授在孔子研究中特别强调严格区分孔学和儒学，认为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是汉儒和宋儒对孔子学说的改造，绝不能把汉儒和宋儒的思想与孔子思想混为一谈。孔学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主干。

孔子新传

● 金景芳 吕绍纲 吕文郁 / 著

長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子新传/金景芳,吕绍纲,吕文郁著.

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80664-949-2

I. 孔... II. ①金... ②吕... ③吕...

III. 孔丘(前 551~前 479)—哲学思想—研究 IV. 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1905 号

责任编辑:张中良 封面设计:王国擎

图片提供:周 粟

长春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·邮编:130061)

<http://www.cccbs.net>

业务电话:8563443 发行电话:8561180 邮购电话:8561177

长春国栋文化传播中心制版

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8.5 印张 350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 册 定价:36.00 元

出版说明

20 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的图书出版界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,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出版物,其中有很多是文化精品。有许多学术著作,经过读者的广泛传告,吸引了一个庞大的阅读群体,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。因为它们或是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毕生心血,或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,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恒久流传的图书。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,这些图书在市面上已经基本见不到了。在阅读愈益深刻的今天,修订出版一批这样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《孔子新传》就是这样的一本书。它由金景芳先生倡议、设计,由金景芳、吕绍纲、吕文郁教授合作完成。金景芳(1902~2001),为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、一代国学大师,原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生导师。该书是金先生毕生研究孔子的一个总结。

本书分为 8 部分:(1)如何评价孔子;(2)孔子的生平与事业;(3)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;(4)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;(5)孔子的教育思想;(6)孔子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思想;(7)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——六经;(8)孔学流传述评。

这本书有如下特点:(1)时下常见的孔子传记往往以叙述孔子的生平为主,而本书则以叙述和评价孔子的学说为主。书中虽然也有两章专门叙述孔子的生平和事业,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。(2)本书开篇即设《如何评价孔子》一章,阐述了孔子研究中的一些原则问题,对学术界流行

的一些有关孔子研究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。(3)金景芳教授在孔子研究中特别强调严格区分孔学和儒学,认为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是汉儒和宋儒对孔子学说的改造,绝不能把汉儒和宋儒的思想与孔子思想混为一谈。孔学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主干。

本书 1989 年出版后,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。

本书原由湖南出版社出版,我社在此基础上,进行了修订,配上了适当的图片,使之图文并茂;开本由原来的 32 开变为 16 开。修订此书,是为纪念孔子诞辰 2557 周年,也是为了纪念金景芳先生。

我们希望该书的修订出版,对于人们了解孔子、孔子思想和孔学会大有裨益,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长春出版社

2005 年 12 月

导读 金老与《孔子新传》

2005 年秋,长春出版社找上门来要给《孔子新传》出再版。书是金老、吕文郁和我三人合写、1991 年 12 月由湖南出版社印行的。金老今已作古,吕文郁和我欣然答应。责任编辑建议应当有个“导读”放在书前,使读者对全书先有个大体的了解,读起来不至于走弯路。我们考虑再三,“导读”确该有,但是不新写,就拿当年我为纪念金老 90 寿辰写的一篇文章作“导读”最合适。那篇文章把《孔子新传》一书须说明白的诸多问题,都一一说明白了。

写这书时金老对有关孔子的一些问题是怎么想、怎么看的,文章都细致讲了。金老的观点我以为很正确、很合适,而且超前。这书就是现在写,也不会写成别的样。那篇文章发表在《孔子研究》1991 年第 3 期上,原题叫《金景芳先生与孔子研究》,现在改做《孔子新传》的导读,题目改叫《导读 金老与〈孔子新传〉》,内容不变。

吕绍纲 识于 2005 年 11 月中旬

今年(1991)6 月 9 日是金景芳先生 90 岁生日,今年又是他从事教育工作 70 年,《孔子研究》邀我写一篇文章,以兹纪念。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。写些什么呢?我想,金先生一辈子都在研究孔子,对孔子这个人物特有兴趣,而且老来弥笃,文章又要发表在《孔子研究》上,于是想出了这个题目。

金先生带领吕文郁副教授和我新近写成一部《孔子新传》,大约 28 万字,12 章,已脱稿交由湖南出版社刊行。我就由这部《孔子新传》说开去。

这部书为什么叫“新传”？金先生当时对我说，孔子的经历问题从司马迁到现在，人们已经讲得够多了，我们就从简，重点放在孔子的学说和它的流传上。还有一层意义金先生没有说，那就是金先生的有些观点是别人前此不曾讲过的，拿出来必令人感到新。

书分12章，实际是8个单元，即：如何评价孔子，孔子的生平与事业，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，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，孔子的教育思想，孔子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思想，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——“六经”，孔学流传述评。

如何评价孔子是孔子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，无论谈孔子的哪一方面，最终都要落到这个问题上。金景芳先生对这个问题想了许多年，他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治世都尊孔，凡是乱世都反孔。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，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。当革命动乱时期，社会需要破，不破坏旧秩序，不能建立新秩序，而孔子学说是破的障碍，人们当然要反孔，至少要冷落他。当社会面临建设，要建立新秩序的时候，再破不止，旧的新的将同归于尽，不会有好的结果，而立是重要的，这时候孔子的学说必然受到重视。以往的历史恰恰又是一治一乱发展过来的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说：“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”孟子已经看出社会的发展总是采取治乱交替的形式。孟子的见解符合以往的客观的情况。这样说来，孔子的命运时好时坏，时而受尊，时而挨批，本是正常的事，不足奇怪。这就叫辩证法。孔子本人的思想就有这个辩证法。不过孔子不叫辩证法，孔子叫“无可无不可”，叫“时”。《论语·微子》记孔子说：“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意思是一切依时而定。

孔子及其思想是客观存在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可能再变。然而孔子思想的价值却是随着时代变化的。金先生举本世纪人们对孔子评价的变化为例论证这个问题。中国自“五四”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革命时期，当时的任务是推倒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，是破坏旧秩序，批孔反孔是必要的、正确的。建国以后，特别在今天，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对待孔子的态度不能不有所变化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不可用今日的情况回过头去派“五四”时代批孔反孔的不是。

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，总体上说要继承。继承本身包含着批判。“五四”时代对孔子的态度批判是主要的，也不曾否认继承。今日对孔子的态度继承是主要的，也不可不要批判。孔子思想中那超时代性的，至今仍具有真理性的精华，我们要继承。至于那些已失去真理性的糟粕，批判是不可避免的。

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问题，学术界一直有争议，有人说是仁，有人说是礼，有人说是仁义。金先生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有两个，一个是“仁义”，一个是“时”。仁义是他的人生哲学，时是他的世界观。两个核心，属于世界观的时当然是根本的。但是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时，没有别的，那又不全面。仁义学说分明是孔子思想的重点，离开仁义

则孔子就不成其为孔子了。

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的观点,金先生已有专文发表(《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0年第5期),讲得十分清楚,无须重复,这里我只谈两点。第一,孔子讲仁也讲义,仁义相连不可分。仁的实质是人,是爱有差等。金先生认为仁义连用不是孟子的专利品,孔子实际上早已仁义连用。《庄子》攻击孔子,言仁必连及义。《庄子》33篇中有17篇仁义连用。《天运》:“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。”《天道》:“孔子曰:‘要在仁义。’”《让王》:“今丘抱仁义之道。”《渔父》:孔子“身行仁义”。庄子是孔子思想的反对派,若孔子本来不是仁义连言,庄子何必强加诸孔子。在《论语》中不见仁义二字连言,但《说卦传》有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就是典型的一句。《周易》之传文是孔子作的,思想属于孔子。《论语》总是把“出则事公卿”与“入则事父兄”,“远之事君”与“迩之事父”,“君君臣臣”与“父父子子”并列而言,其实就是仁义连用。《论语·里仁》:“子曰:‘唯仁者能好人,能恶人。’”“能恶人”就是义。孔子言仁时,内里已经有义在了。这是仁义连用的问题。孔子的仁概念之含义问题,金先生常常同我谈起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他说韩愈“博爱之谓仁”,张载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,朱熹“仁是心之德,爱之理”,都不是孔子立言的本意。孔子讲的仁,可以理解为爱,但是爱有差等,不是博爱,不是对什么人都施以同样的爱,而且不但能爱人,还要能恶人。仁所要求的只是人类自身的爱,人对物的爱或动物之间的爱,都不可称之为仁。张载的“民吾同胞”,泯灭了爱的差等;“物吾与也”,否定了人类与物之间的界限。人对动物可以言爱而不可以言仁。《庄子·天运》记庄子说:“虎狼仁也。”这话不对。虎狼有爱子之本能,不能推及于同类,故不可谓仁。仁只在人类中存在。所以金先生对《中庸》所记孔子的那段话最重视,说那是关于仁义的最好注释。那段话是:“仁者人也,亲亲为大。义者宜也,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,尊贤之等,礼所生也。”尊贤即尊尊。仁义来自于亲亲即人的血缘关系和尊尊即政治关系,而不是朱熹说的什么“心之德,爱之理”和“心之制,事之宜”。

关于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问题,我要说的第二点是“时”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。近些年来,金先生多次同我讲起孔子的时。以为孔子思想中最根本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时,就是变化,用今语表达就是辩证法,也就是要求人们看问题做事情要依时为转移。客观世界是变的,人处理问题的对策也要相应地变。掌握变化的分寸,不使过或不及,就是中。所以时里包括中,时也称时中。中,不是不偏不倚、取两端之中。中,实际上是说看问题做事情选出最合时宜的最佳方案。孔子有时也把时中称做中庸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:“子莫执中,执中为近之。执中而无权,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,为其贼道也,举一而废百也。”执中要有权。孟子说的是子莫的执中。孔子的中也要有权,当属无疑。执中有权的时即时中、中庸。金先生说,为什么《中庸》记孔子说“天下国家可均也,爵禄

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。中庸不可能也”？为什么说“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鲜能久矣”？因为中庸最难能。要人明确干一件什么事情或者不干一件什么事情，例如去死，去放弃地位，只要想干便可以干成；而要人在一切时候，对待一切问题，都能因时制宜，做到分寸恰当，最合尺度，却远不是想办就可以办到的。孔子时中的思想，孟子理解最为深刻，可惜后人完全忽略了。

言及孔子的时、时中、中庸，金先生最近特别注意唐宋人说的道统问题。韩愈《原道》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。”韩愈说孔子的道统传自尧舜，不是孔子首创，但道统是什么，韩愈未明言。宋人提出所谓十六字，朱熹在《中庸章句序》中说：“道统之传有自来矣，其见于经，则‘允执厥中’者，尧之所以授舜也。‘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’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”这十六字心传原出伪古文《尚书》之《大禹谟》，不足凭信，但“允执其中”一语则见于《论语·尧曰》，其文曰：“尧曰：咨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《中庸》也说：“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《论语》与《中庸》都言及“允执其中”的问题，尧舜禹相传的必是这个。金先生说“允执其中”、“执其两端用其中”，实堪注意。为什么尧向舜交权，舜向禹交权，都什么也不说，只强调地交代这句话？必是这句话最重要，最有普遍意义。做到这一条，其余具体的要求不须说。“历数”是什么？金先生说，古训皆未得要领，应以《尧典》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”为正解。天是有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之天，历象是观测计算日月在经星二十八宿背景上的运行时间。据此制定历法，颁行天下遵循使用，就是“敬授人时”。人指上层人士，不是普通庶民百姓。庶民百姓称民不称人。古代颁行历法是件大事，是天子（先前是部落联盟酋长）才有的权力。天子每年颁朔给诸侯。这叫朔政制度。天子的权力以朔政为标志。故后世夷狄来服叫奉正朔。朔政起于“历象日月星辰”即“历数”，故“历数”便成为天子权力的另一种称谓。《论语》何晏注：“历数谓列次也。”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“历数，帝王相继之次第，犹岁时节气之先后也。”何、朱二说并误。

“允执其中”与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意义相同。“允执其中”，须先执其两端。没有两端就谈不到中。中是两端的中。两端是什么？郑玄以两端为“过与不及”，朱熹以两端“谓众论不同之极致。盖凡物皆有两端，如小大厚薄之类”。金先生说郑、朱二人说是。“两端”用今语说就是矛盾。执中不是不偏不倚，正取中间，即折中主义、中间道路。程子说“不偏之谓中”，是不对的。不偏不倚，在两端的正中间，是执一，不是执中。执一是确定的、不变的，简单易能。执中是不确定的、多变的，几乎不可能。执中要像权（秤锤）那样依着轻重摆动不居，却又不像权那样容易把握。心中像有一杆秤一样，恰当准

确地反映事物的变化,当然是极难的。这就是孔子说“中庸不可能也”和尧舜禹传说时代时什么都不说,只说“允执其中”这句话的缘故。一个人倘能做到“允执其中”,便任何问题都能解决,都能应对。唐宋人所说道统若指此而言,那末道统说是可信的。韩愈说道统至于孟子之后不传,也是对的。孟子的确深刻理解并把握了孔子的时中概念,孟子之后的人则大多不甚得要领,宋以后尤甚。

这是金先生的孔子思想两个中心说,已写进《孔子新传》。

孔子哲学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这个问题很麻烦,不易解决,许多人实际上把这个问题避开了。金先生则很明朗,一点不含糊地说孔子哲学是唯物论的。这里有两点是重要的。第一,金先生研究《周易》多年,越来越相信《易传》系孔子所作,《易传》的思想既是《周易》的,也是孔子的。因此,金先生主张研究孔子除《论语》外,还要根据《周易》一书。《论语·阳货》记孔子说: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!”人们都承认这几句话是唯物论的,这个天是自然之天,不是主宰之天,但是《论语》里能说明问题的话只有这么一段,等于孤证,所以人们又都不肯明言孔子思想是唯物论的。金先生将《论语》同《周易》联系起来看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《系辞传》: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。”太极是物质性实体,太极之前还有什么,它不说了,这显然是唯物论。至于《易传》的其他言论,如《序卦传》:“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。”《乾卦》辞:“乾,元亨利贞。”《坤卦》辞:“坤,元亨利牝马之贞。”《乾·彖传》:“大哉乾元,万物资始,乃统天。”《坤·彖传》:“至哉坤元,万物资生,乃顺承天。”《系辞传》:“法象莫大乎天地,变通莫大乎四时。”等等,无不与《论语》“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”的观点如出一辙。第二,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模棱两可,不说有鬼神也不说没有鬼神,让人看不透他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。孔子说“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,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”,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(《先进》)。这些话不否定鬼神也不肯定鬼神。许多人认为不否认鬼神就是相信有鬼神。金先生认为不肯定鬼神就是不相信有鬼神。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允许孔子公开否定鬼神,不肯定也不否定,是最明智的办法。金先生举出《荀子·天论》的一段话揭开了儒家鬼神观的秘密。荀子说:“日月食而救之,天旱而雩,卜筮然后决大事,非以为得求也,以文之也。故君子以为文,而百姓以为神。以为文则吉,以为神则凶。”信鬼神全是表面文章,不信鬼神才是实质。

孔学自孔学,儒学自儒学,儒学不等于孔学。后世著名的汉学、宋学都是儒学,不是孔学,儒学渐渐发展的过程,恰是孔学渐渐衰落的过程。这是金景芳先生的又一重要观点。金先生主张划分清楚孔学与儒学的界限,不要用后世的儒学冒充孔学。儒学,新儒学,现代新儒学,都可以研究,但要说清楚,它们就是它们,它们不是孔学。它们多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搞自己的东西。例如人性论问题,孔子说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(《论语·

阳货》),是正确的。性是人的自然属性,大家都一样,所以叫性。近,说明人与人有共性,也有差异性,即个性。所以说相近而不说相同。习是后天习染,是人的社会属性。人在社会属性上差别是大的,所以说相远。社会属性人与人差别大,所以孔子不称性而称习。孟子言人性善,荀子言人性恶,都把后天的习当做先天的性,不是孔子立意所在。董仲舒说:“性者天质之朴也。善者王教之化也。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,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。”(《春秋繁露·实性》)董氏把性与善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分开看,是正确的。至宋代,理学家们把理概念加入人性中,是唯心论的人性论,距孔子更远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释“性相近”引程子曰:“此言气质之性,非言性之本也。若言其本,则性即是理,理无不善,孟子之言性善是也,何相近之有哉!”宋人为了将理纳入人性,在气质之性即自然属性外提出所谓本然之性,本然之性就是理。金先生说,宋人的理相当于《老子》“道生一”的“道”,是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。他们把孟子说的性善看做性之本,比孟子悖离孔子的“性相近”观点尤甚。

金景芳先生认为汉儒的学问已严重地离开孔学。他以郑玄释《周易》为例说明问题。郑玄注《周易》,硬将五行说加入,说什么“天一生水于北,地二生火于南,天三生木于东,地四生金于西,天五生土于中。阳无耦,阴无配,未得相成。地六成水于北,与天一并。天七成火于南,与地二并。地八成木于东,与天三并。天九成金于西,与地四并。地十成土于中,与天五并。”纯属无知妄作,为后世伪造河图、洛书的妄人和江湖术士张目,影响很不好。郑玄是汉代杰出的注释家,精通“三礼”,擅长名物训诂,然而一涉及《易传》,涉及孔子思想,便相当蹩脚。郑玄尚且如此,余如京房、荀爽、虞翻之流,则不须提。

宋人中名气最大的是朱熹,宋学可以他作代表。他对孔学研究不深。《周易》这部书,孔子说它“开物成务,冒天下之道,如斯而已者也”(《系辞传上》),以为是讲思想的。荀子、庄子、董仲舒、司马迁,乃至王弼、程颐,许多学者,都承认孔子的说法。而朱熹作《周易本义》,以为《周易》本是卜筮之书,后人以思想之书说解它,是不对的。《周易》当然是卜筮之书,此不待朱熹言。孔子明明说《周易》是讲思想的,卜筮之中包含着哲学,朱熹竟不理解,一味从卜筮的角度说《周易》,足见其识见低浅。

朱熹之外,金先生特别提及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和程颢的《识仁篇》、《定性书》。指出宋人的这些论著,表面上讲孔子,其实是讲他们自己的东西。《太极图说》开篇说:“无极而太极,太极动而生阳,动极而静,静而生阴,静极复动,一动一静,互为其根,分阴分阳,两仪立焉。”孔子说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”,以太极这物质性实体为世界本原,周氏在太极之先加上无极,与《老子》在“一生二”之前加上一个“道生一”一样,陷入唯心论。周氏的无极与老氏的道并无二致。

《太极图说》又说:“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,五气顺布,四时行焉。”《易传》只讲阴

阳寒暑，四时往来，不讲五行。五行之说最早见于《尚书·洪范》。《周易》书中没有一点五行的影子。把五行说拉入《周易》，完全违背孔子原意。

程颢的《识仁篇》开篇说：“学者须先识仁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。”意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。金先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，说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绝对不是孔子的。孔子强调的是“仁者人也”。仁是讲人的，人以外的一切生物无生物，皆与仁无涉。《孟子》说：“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《吕氏春秋》说：“仁也者，仁乎其类者也。”最得孔子仁概念的真谛。孔子最重视人在天地之间的崇高地位，注意划开人与动物的界限，说“鸟兽不可与同群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，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（《说卦传》），哪里有“仁者浑然与万物一体”的意思！

《孟子·尽心上》说：“孟子曰：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《识仁篇》以“盖良知良能，元不丧失”释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以为“万物皆备于我”即人人皆具佛性。金先生则以为孟子讲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恰恰体现孔子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的行仁方法。此“万物”之物宜训作人。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不过是说，他人的欲与不欲，我全知道，全理解，我能做到“反身而诚”，就是仁。《识仁篇》显然歪曲了孟子，违背了孔子。

《定性书》说：“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，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。”又：“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天地无心，圣人无情，一切皆出自自然。与《老子》之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”同义。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，更不是孔子一贯力行的积极学习、奋斗进取的精神，倒是极像《庄子·应帝王》“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”的观点，与《老子》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思想亦无不同。

金先生特别注意到宋学未能承继孔子学说这个事实，告诫切勿错把宋学作孔学。孔学中的唯物论、辩证法、仁义礼这些具有超时代意义的精华，今日仍有价值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不加以吸取。宋学中的理、心、性、命诸说，与孔学迥异，说它们是新儒学可，说它们是孔学则大不可。宋人的东西，清人已有过批判，尖锐地指出过它们的弱点和谬误，今日尤其有必要认识它们。金先生主张首先把历代强加到孔子身上的东西一一剥净，还孔子学说的真面目，然后把它介绍给当代社会。

金先生研究孔子除《论语》外，特重“六经”，以为研究孔子而与“六经”隔断，则孔夫子便成为空夫子。“六经”是孔子竭毕生之力学习先代历史文化，经过选择整理并加入自己的见解而著成的，是孔子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。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“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，于是论次《诗》《书》，修起《礼》《乐》。”什么是“论次”？论是去取，“次”是编排。“修起”则是由于礼坏乐崩，孔子努力搜讨，把它们修复起来。“论次”与“修起”，内里都含有孔子的用心。孔子编《诗》和编《书》，都经过精心挑选，颇动一番

脑筋。例如《诗》十五国风的次第,“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”,皆不是任意安排,都是有深刻意义的。《春秋》是孔子据《鲁史》而作,《孟子》与《史记》已有定论,可无疑义。孔子对《周易》做的是诠释工作。这后两部书与孔子关系至深。《庄子》说“《春秋》以道名分”,董仲舒说“《春秋》以道义”,证明《春秋》是反映孔子之政治思想的书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说“《易》本隐以之显”,《庄子》说“《易》以道阴阳”,证明《易》是讲哲学的书,反映孔子的宇宙观和方法论。

以上扼要地说了金先生关于孔子研究的几点见解。这些见解能否取得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,我现在不得而知,但我本人是心悦而诚服的。我坚信这些见解符合孔子的实际,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,它们一定会为大多数人所接受。我把这些话献给金先生 90 岁生日,也献给《孔子新传》的热心读者。

(原刊《孔子研究》,1991 年第 3 期)

序

这本书的名子叫《孔子新传》。它是由我创议,由我设计,由我和吕绍纲、吕文郁三人共同完成的。其中《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》、《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》、《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——六经》是我写的,《孔学流传述评》、《孔子的教育思想》、《孔子的政治、经济军事思想》是吕绍纲写的,其余是吕文郁写的。

本书之所以称“新传”,新在哪里呢?新在本书不是把孔子的生活经历放在主要地位,而是把孔子的学术思想放在主要地位。在评述学术思想时,力戒不深不透。遇到重大问题,决不回避,一定阅读大量资料,经过深入仔细地研究,求得肯定确切的答案。不赞成模棱两可,闪烁其词,或泛泛征引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撑持门面。

在中国,自秦亡以降,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,一般都尊孔子为圣人,这是事实。当今海外各国,特别是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,依旧尊崇孔子,这也是事实。孔子在历史上,曾经遭受过无数次冷遇、奚落,以至于长时期挨批,这也不能说不是事实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有人曾因此而困惑。本书开篇即设《如何评价孔子》这样一个题目,就是为说明这个问题。

我们认为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所云“天下之生久矣,一治一乱”是对的。人类社会的历史,就是通过一治一乱或者说量变质变交替进行向前发展的。应该看到,中国自孔子生时起,一般说,凡是治世都尊孔,凡是乱世都反孔。其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,对破坏社会安宁秩序不利。而社会当革命时期重在破,不破除旧秩序,不能建立新秩序。社会当建设时期,也就是建立新秩序的时期重在立,不能再破了,再破,旧的新的将同归于尽,不会有好的结果。由此可见,该破的时候要破,该立的时候要立,这就叫做辩证法。持形而上学观点的人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。

中国自“五四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革命时期。革命时期批孔是正确的。因为它有利于推倒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。今日不同了,今日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,对孔子这样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,就不能不重新加以评价了。

毛泽东同志说过: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我们应当给以总结,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。”看来我们今日就行动起来,努力做承继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工作是不会有过错的。不过,毛泽东同志曾提到“总结”、“珍贵”等字样,说明在孔子思想中还有精华与糟粕之分,全盘继承是不能允许的。

那末,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精华与糟粕呢?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,认为有真理性的是精华,没有真理性只有时代性的是糟粕。具有真理性的应当继承,没有真理性只有时代性的应当批判。亦即自今日看来,凡是具有奴隶性的、封建性的都要批判。



■ 孔子像

根据我们的看法,认为在孔子学术思想中,精华是大量的,当然不能说没有糟粕。

在谈继承孔子的珍贵遗产的时候,有一个问题,想提出来谈一谈,这就是孔学与儒学问题。今人习称孔学为儒学,往往把孔学与儒学并为一谈。我觉得这种做法不恰当。

因为今人所谓儒学,实际上包括汉儒之学和宋儒之学。据我看来,汉儒、宋儒虽然打的都是孔子的旗号,实际上他们所传承的多半是孔子学说中的糟粕,至于精华部分,他们并没有传承,反而肆意加以歪曲和篡改。因此,今日应把真正孔子之学正名为孔学,与汉儒之学、宋儒之学相区别。

那末,什么是真正的孔子之学呢?我认为主要是“六经”和《论语》。七十后学的记述及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二书的一部分,也应包括在内。在上述著述中,最能反映孔子思想的,首推《易传》,其次是《春秋》,再次则是《论语》。其余诸书亦时有精语,不宜忽视。

什么是孔学中具有真理性的精华呢?因限于篇幅,不能在这里详谈。在这里只简要地谈谈孔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。我认为孔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正确的,是具有真理性的。作为孔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当然贯穿在他一生的言论和实践之中,但是,集中表现则在《易传》与《论语》二书。

谈《易传》不能不先谈《易经》,因为《易传》是解说《易经》的。《易经》是什么书呢?向来都说它是卜筮之书。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,但不够全面。正确地说,它是具有卜筮的形式与哲学的内容的一个矛盾统一体。殷周之际,周人之所以制作这样一种书,目的何在呢?目的在于使统治人民的手段达到完善而有效。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人民的认识水平普遍低下,他们只听命于宗教迷信,不能直接用哲学思想进行说教。当时的统治者乃采取另一种办法,即利用卜筮的形式而赋以哲学的内容,间接地进行说教。《易·系辞传上》说:“其孰能与于此哉,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!”正是说明这个问题。这个秘密,经过多少年没有人发现。只有孔子,如“世人皆醉我独醒”,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秘密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: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读《易》韦编三绝。”这就是孔子发现秘密时,喜不自胜,于是惨淡经营,而写成《易传》的真实情况。《易·系辞传上》说:“子曰:‘夫《易》何为而作也?夫《易》开物成务,冒天下之道,如斯而已者也。’”这正是孔子明确地在说:《易经》是哲学著作,不是别的什么东西。古人说“唯英雄能识英雄”。因此我认为,《易经》的哲学思想,既是《易经》作者的,也是孔子的。

《易·系辞传下》说:“《易》之为书,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,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六者非它也,三才之道也。”《说卦传》说:“昔者,圣人之作《易》也,将以顺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,立地之道曰柔与刚,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兼三才而两之,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”上述两段话说的是什么问题呢?是说《易经》的全部内容讲天地人三才之道的。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是兼三才而两之。即每一卦都是六画。这六画由下往上数,初二两画为地道,三四两画为人道,五上两画为天道。即每一卦都代表天地人三才之道。而天之道是阴与阳,地之道是柔与刚,人之道是仁与义。什么是道呢?从文字学的意义来说,道是人用脚踩出来的。例如说:“桃李无言,下自成

蹊”，蹊就是道。用哲学的语言说，道就是规律。“天之道”、“地之道”或“天地之道”是自然规律，“人之道”则是社会规律。

在《易传》里，《乾文言》说：“与天地合其德”，“先天而天弗违”，这里的“天地”与“天”是一个意思，都指的是大自然。所不同的是，“天地”是全称，而“天”是简称。《系辞传上》说“天之道”，《系辞传下》说“天地之道”，《说卦传》说“天之道”、又说“地之道”，也是一个意思，都指的是自然规律。所不同的是“天地之道”是合在一起说，说了“天之道”又说“地之道”是分开来说。单称“天之道”实是“天地之道”的简称。

《说卦传》所说的“阴与阳”、“柔与刚”、“仁与义”，其实不是别的，就是辩证法的对立的统一。结合《易经》全部内容来看，可以断言，《易经》作者已认识到对立的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。

为什么《说卦传》说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”，而《系辞传下》说“乾，阳物也。坤，阴物也”呢？这是说单把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，天是由阴与阳构成的。把天地共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，则天是阳物，地是阴物。应当指出，上边所说的天或天地是指“天之道”的天或“天地之道”的天地，而不单纯是指大自然的天或天地。

例如《说卦传》说“乾为天”，就不能理解为只是苍苍者，而应理解为决定它发展变化的那个天。据我看，这就是日，一般称为太阳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：“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，大报天而主日也。”是其证明。《易经》开篇两卦是乾坤，乾象天，坤象地。《乾》卦《卦辞》说：“元亨利贞”。“元亨利贞”象天的发展变化。天的发展变化，具体说就是春夏秋冬四时。《系辞传下》说：“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相推而岁成焉。”《系辞传上》说的“变通莫大乎四时”也是说明这个问题。天的变化为春夏秋冬，正是太阳在起作用。《坤》卦《卦辞》说：“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”元亨利贞象地的发展变化。但多了“牝马之”三字。这“牝马之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认为“牝马之”当依《黑鞮事略》说：“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，作移刺马种。外余者多扇了，所以无不强壮也。移刺者，公马也，不曾扇，专管骡马群，不入扇马队。扇马骡马各自为群队也。又其骡马群，每移刺马一匹管骡马五六十匹。骡马出群，移刺马必咬踢之，使归。他群移刺马逾越而来，此群移刺马必咬踢之。”依此作解，即坤与乾的发展变化虽是共同的，所谓“阴阳合德”。然而坤对乾当如骡马对移刺马，要“后”，不要先，要“顺”，不要逆。《乾·象传》说：“大哉《乾》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”《坤·象传》说：“至哉《坤》元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”就说明这个问题。从生活实际来看，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说“春日载阳”就是乾元的“万物资始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说“草木萌动”就是坤元的“万物资生”。一个是“统天”，一个是“顺承天”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《序卦传》说：“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问题。《系辞传上》说：“乾坤，其《易》之缊邪？”《系辞传下》说：“乾坤，其《易》之门邪？”说的也是这个问题。其